

伊斯兰世界联盟与沙特阿拉伯关系论析^{*}

何思雨

摘 要：基于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制度性、结构性联系，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与资助国(本国)的关系十分紧密。伊斯兰世界联盟(伊盟)在资金、人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被沙特全面掌控，在战略、形象、行动等层面全方位为沙特政权服务，是沙特的利益维护者、形象塑造者、舆论引导者、行动参与者和职能承担者。伊盟与沙特的紧密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正负面双重影响。一方面，沙特的全方位支持使伊盟拥有雄厚的资源和实力，但这种全面掌控导致伊盟的非政府属性和独立性弱化，使其难以形成相对中立与公正的立场，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宗教偏向，影响组织公信力，还造成伊盟的相对封闭性和保守性，导致其改革困难。另一方面，凭借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优势，伊盟在为沙特开拓外交空间、减轻道义压力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但强烈的宗教属性、沙特偏向性及涉恐传闻给沙特国家形象带来困扰。未来，伊盟的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处理好与沙特的关系，即在依托沙特资源的同时，增强自身主体性、自主性、中立性和公信力，处理好沙特政权与教权、宗教保守性与世俗现代化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伊斯兰世界联盟；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

作者简介：何思雨，博士，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助理教授(深圳 51806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2)06-0057-19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研究”(21CGJ043)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关系

国际组织是基于特定目的、以一定形式设立的跨国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它源于国家间合作的需求,最初是从属于国家间权力政治的产物。随着国际组织自主性及其能力的提升,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制开始对国家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始终有限。国际组织“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国家组织或世界政府,而是各国政府单独地或集体地实现其对外政策的工具”^①。大国在国际组织成立、运作及效用发挥上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大国的承认与支持是国际组织合法性与权威性的重要来源。其次,大国的物质供给是国际组织生存、发展和正常运行的关键要素。最后,大国是国际组织有效作为和目标达成的主要保障。因此,国际组织在制度设计、决策方式、议程设置、行为偏好及具体操作中都需要不同程度地体现大国意志。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国际社会在政府、市场等方面的“失灵”、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果。它更多是基于普遍的价值观念致力于解决某些特定或全球问题,强调自主性、民间性、灵活性以及对国家和权力政治的相对超脱性,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但这种自主性和制约始终有限。“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和‘国家’关系复杂化使得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的关系变得复杂,即国际非政府组织经常超越国家,但后者未必总能驯服前者。”^②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资助国(本国、他国)以及对象国的关系均呈现不同特点,其与资助国(本国)主要存在合作与互补、对立与零和、依赖与制约和各行其道等关系模式。^③

宗教非政府组织是“建立在某一宗教信仰之上,宣称其身份和使命是基于一种或多种宗教或精神传统的非营利、独立和志愿组织,旨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和实现公共福利”^④。它的非政府性主要指“处于政府体制之外,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以取得政权或执政为目标”^⑤。在具有政教合一传统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与国家、社会紧密联系,相当数量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实际上由个别国家发起并控制,是服务于后者国家利益的工具。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① 饶戈平:《试论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法的关系》,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第68页。

② 韩俊魁:《超越国家还是被国家驯服?——国际非政府组织生成的人类学研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10页。

③ 王杰等:《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9页。

④ 秦倩:《国际法与宗教非政府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

⑤ 秦倩:《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实践与法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包括:一是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制度性、结构性联系。历史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由分散的部落联合为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使“‘伊斯兰’既是宗教,也是社团、社会、民族和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①。因此,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很难与政府完全分割。二是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是新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产物。新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伊斯兰团结,主要载体是以伊斯兰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各类伊斯兰国际机制。因此,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抓手,伊斯兰国家尤为强调对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掌控。三是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权威和资源主要来自主权国家。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强调在塑造伊斯兰教良好形象、维护穆斯林合法权益等方面提供公共产品。但鉴于伊斯兰世界的跨国公民社会还未发展成熟,其公信力、权威性及所依赖的物质资源仍主要来源于国家,因此在议程和活动中必须要反映国家意志。

作为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倡议并建立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以下简称“伊盟”)^②是服务沙特政权和国家利益的工具。目前,学界对伊盟的研究仍处起步阶段。^③诸多研究都注意到沙特与伊盟的密切关系,定义了伊盟的三种角色定位:一是扩展官方瓦哈比派影响力的宣教组织^④,二是扩大沙特在伊斯兰世界和全球穆斯林社群话语权的外交工具^⑤,三是与部分恐怖组织存在一定联系的宗教组织^⑥。总体上看,既有研究虽关注到沙特与伊盟的特殊关系,但尚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沙特对伊盟的掌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沙特对伊盟组织运行、政策制定和行为方式有何影响?伊盟在沙特内政外交中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① 吴云贵:《伊斯兰教对当代伊斯兰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载《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第1页。

② 也译作“穆斯林世界联盟”。

③ John L. Esposito,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Islamic World*, Vol. 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91-192; [埃及]拉法特·格尼米·谢赫:《伊斯兰世界联盟:五十年的贡献》(阿拉伯文),开罗:凯里麦出版社2010年版;马丽蓉:《伊盟、伊合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30页;何思雨:《伊斯兰世界联盟参与全球治理研究》,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6期,第129-155页。

④ Jacob M. Landau, *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Teresa Harings,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Creeping Wahhabi Colonialism?,” *Telaviv Notes*, Vol. 6, No. 8, 2012, pp. 1-4.

⑤ Thomas Hegghammer, *Jihad in Saudi Arabia: Violence and Pan-Islamism Since 197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⑥ Pierre Conesa, *The Saudi Terror Machine: The Truth About Radical Islam and Saudi Arabia Revealed*,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8.

二、全面掌控：沙特与伊盟关系的主要基调

凭借宗教圣地优势,沙特长期致力于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盟主。1926 年伊本·沙特就在麦加召开“世界穆斯林代表大会”,希望接手奥斯曼帝国后的哈里发制度,虽未能如愿,但世界穆斯林大会后期发展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在中东内部主要表现为亲西方的君主制政教合一政权与亲苏联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对抗,并突出表现为埃及主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沙特主导的泛伊斯兰主义对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①。沙特大力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外交,创建一系列伊斯兰国际机制,支持和掌控多个伊斯兰国际组织。1962 年成立的伊盟就是沙特以“‘伊斯兰团结’抗衡埃及‘阿拉伯团结’的产物”^②。沙特对伊盟进行着全面掌控。

(一) 物质供给

资金是国际组织正常运作的基础,资金支持力度决定行为体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性质、议题和行为。沙特主要通过政府、个人和机构三个层面进行物质供给。在政府拨款层面,伊盟成立之初沙特就提供了约 25 万美元,至 1980 年已达到 1,300 万美元。^③ 1962 年至 1999 年,伊盟共花费近 16 亿美元,超过 90% 的资金由沙特提供。沙特每年投入 2,133 万美元用于支付海外宣教者薪水、达瓦宣教活动和全球伊盟中心,每年还提供 533 万美元用于清真寺建设。^④ 在个人捐赠层面,沙特王室成员和教界高层经常向伊盟缴纳天课和捐赠瓦克夫^⑤,掌握国家绝大部分资源的高层精英的私人捐赠成为沙特官方资助的另一重要形式。在机构注资层面,伊斯兰合作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企业经常以项目方式向伊盟

^① 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8 页。

^② 何思雨:《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现状的多维考察》,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79 页。

^③ Pew Research Center's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Muslim Networks and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010, p. 28.

^④ Khaled M. Alghoraiyr, *Saudi Arabia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ssistance to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1975-1995*, Ph. D. dissertation, Howard University, 2001, pp. 195-196.

^⑤ “瓦克夫”系阿拉伯语单词 *waqf* 的音译,原意是“保留”、“留置”。瓦克夫是具有社会慈善性质的伊斯兰宗教基金,指穆斯林将土地、房屋、金钱等自身财产捐献作为宗教基金,财产所有权属宗教公产,使用权和收益权永久捐献给宗教慈善机构。瓦克夫的拥有者在转让处分权的同时,约定将其收益用于限定的慈善目的。

注资。这些机构的资金基本也由沙特提供,但来源较为复杂并缺乏透明度。如伊盟的重要资金来源巴拉克银行(Al Baraka Bank)主要由费萨尔伊斯兰银行(Faisal Islamic Bank)支持,而费萨尔伊斯兰银行又是沙特资助推广国际伊斯兰主义的核心组织“伊斯兰货币局”(Dar al-Maal al-Islami)^①的下属机构。^②此外,沙特还会向伊盟捐赠土地、楼宇,伊盟总部大楼即由时任沙特国王法赫德(Fahd bin Abdulaziz Al Saud)捐赠。同时,伊盟在沙特国内设立了多个宗教基金和企业从事贸易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所赚取的利润也是其资金补充。

(二) 人事控制

人员构成和人事任命是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权力的直接体现。伊盟内部所有高层职位均由具有深厚政府背景的沙特公民担任。例如,伊盟最高决策机构“宪章委员会”(Constituent Council)^③由沙特最高宗教权威大穆夫提直接领导。伊盟宪章规定宪章委员会由来自不同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60名委员组成,并根据每个国家和地区不超过2名代表的原则进行任命。但实际上,宪章委员会62名委员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沙特委员达9名,远超这一限制,^④其余国家和地区的委员均未超过3名。宪章委员会的运行机制是讨论并审议秘书处或三位委员组成的提案小组所提交的议案,决策后交秘书处执行。这一机制有利于沙特制定满足自身利益的政策。又如,伊盟历任秘书长均出身沙特精英阶层,都是

^① “伊斯兰货币局”(Dar al-Maal al-Islami / Islamic Money House, DMI)成立于1981年,总部位于瑞士。

^② Pierre Conesa, *The Saudi Terror Machine: The Truth about Radical Islam and Saudi Arabia Revealed*, pp. 43-44.

^③ 也有研究根据阿拉伯语名称译为“创建委员会”,伊盟机构改革后称为“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④ 分别是萨利赫·本·穆罕默德·路海丹(Saleh bin Mohammed Al-Luhaidan)、阿卜杜·拉赫曼·哈姆宰·马尔祖基(Abdul Rahman Hamza Al-Marzouki)、阿卜杜·阿齐兹·艾哈迈德·里法伊(Abdul Aziz Ahmed Al-Rifai)、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Abdul Aziz bin Abdullah bin Baz)、阿卜杜拉·本·奥马尔·纳西夫(Abdullah bin Omar Naseef)、穆罕默德·阿卜杜·盖尤姆·汗(Muhammad Abdul Qayyum Khan)、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赛利姆(Mohammed Abdullah Salem)、穆罕默德·阿卜杜·亚马尼(Mohamed Abdel Yamani)、穆罕默德·奥马尔·陶菲克(Muhammad Omar Tawfiq)。这些委员均来自沙特政界和教界高层,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是唯一不出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萨利赫·本·穆罕默德·路海丹曾任沙特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本·奥马尔·纳西夫曾任伊盟秘书长、世界穆斯林大会主席。参见[埃及]拉法特·格尼米·谢赫:《伊斯兰世界联盟:五十年的贡献》(阿拉伯文),开罗:凯里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162页。

沙特最高宗教机构“高级学者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Scholars)的成员。^①另外,伊盟各附属组织基本也由沙特公民领导,^②附属组织委员会的沙特委员数量也明显多于其他国家。^③在海外机构,伊盟一般派遣沙特公民担任负责人,确保其完全执行总部政策。本地雇员主要从事事务性工作,晋升较难。沙特使馆也与伊盟海外机构深度交织,部分外交人员兼任一些机构的领导职务。^④此外,是否服从沙特官方立场也是伊盟人事的重要考量。1978 年以来一直担任伊盟下属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秘书长的法利德·库拉什(Farid al-Qurashi),因对沙特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结盟持怀疑立场,于 1993 年被亲政府人士阿德南·哈利勒·巴沙(Adnan Khalil Basha)所替换。^⑤

(三) 意识形态塑造

瓦哈比教义是沙特官方意识形态。虽然诸多研究都认为伊盟致力于传播保守瓦哈比教义,但实际上伊盟的意识形态更多是一种服务于沙特政权需求、混合部分其他派别思想、较为温和现代的瓦哈比教义。首先,伊盟吸收了部分其他派别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更具包容性。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奉行世俗民族主义的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打压以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为代表

① 如伊盟首任秘书长穆罕默德·本·苏罗尔·萨班(Muhammad bin Suroor Al-Sabban)被称为“现代沙特经济之父”,曾任沙特财政大臣;第二任秘书长穆罕默德·本·萨利赫·卡扎兹(Muhammad bin Saleh Al-Qazzaz)曾负责禁寺和先知清真寺的扩建;第三任秘书长穆罕默德·本·阿里·哈拉坎(Muhammad bin Ali Al-Harakan)曾任沙特司法大臣;第四任秘书长阿卜杜拉·本·奥马尔·纳西夫(Abdullah bin Omar Naseef)曾任世界穆斯林大会主席;第五任秘书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阿里·迈达尼(Ahmad Muhammad Ali Al-Madani)曾任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第六任秘书长阿卜杜拉·本·萨利赫·奥贝德(Abdullah bin Saleh Al-Obeid)曾任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校长和沙特教育大臣;第七任秘书长阿卜杜拉·本·阿卜杜·穆赫辛·图尔基(Abdullah bin Abdul Mohsen Al-Turki)曾任沙特伊斯兰事务部大臣;现任秘书长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卡里姆·伊萨(Mohammad Ibn Abdul Karim Alissa)曾任沙特司法部大臣。

② 如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秘书长哈桑·达尔维什·沙赫巴尔(Hassan Darweesh Shahbar)、国际《古兰经》诵读组织秘书长阿卜杜拉·伊本·阿里·巴斯法尔(Abdullah Ibn Ali Basfar)、伊斯兰教法委员会秘书长萨利赫·本·赞本·马祖迪(Saleh bin Zaben Al-Marzouqi)。

③ 如伊斯兰教法委员会达到 12 位、世界清真寺委员会达到 9 位。参见 MWL, “Muslim World League — 50 Fruitful Years in the Service of Islam and Muslims,”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38, No. 8, 2010, pp. 19–23。

④ 如伊盟日内瓦伊斯兰中心的主管、日内瓦大清真寺伊玛目优素福·易卜拉欣(Yussuf Ibrahim)是摩洛哥人,曾获沙特奖学金赴麦地那留学。他毕业后在伯尔尼的沙特大使馆工作,随后到日内瓦伊斯兰文化基金会,因反对沙特在海湾战争的立场遭解雇。参见 Pierre Conesa, *The Saudi Terror Machine: The Truth About Radical Islam and Saudi Arabia Revealed*, p. 70。

⑤ Marie Juul Petersen, *For Humanity or for the Umma?: Aid and Islam in Transnational Muslim NGOs*,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5, p. 216。

的宗教政治势力。沙特则收容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抗衡。部分流亡的穆兄会成员参与了伊盟的筹建工作,埃及的赛义德·拉马丹(Sayyid Ramadan)就是伊盟宪章的起草者之一。^①“沙特和穆兄会这一心照不宣的联盟,通过提供一个更适合冷战时代政治视野的教义兄弟网络来支持瓦哈比教义传播。这一联盟的机制性表达即是伊盟。”^②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期间,伊盟在白沙瓦的工作人员很多也是穆兄会成员。^③其次,区别于民间“当代瓦哈比派”较为激进的思想,伊盟在严厉谴责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出访宣传、召开会议、设立机构等方式积极传播伊斯兰教温和、包容和中道的思想,塑造伊斯兰教的正面形象。伊盟还特别注重开展跨宗教对话,加强不同信仰群体的理解与沟通。伊盟与罗马教廷等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的组织互动较为频繁,2018年伊盟秘书长伊萨率团访问梵蒂冈就产生了较大影响。^④最后,伊盟对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现代技术持包容和开放态度,提倡利用现代科技进行宣教,会根据沙特政权需求作出相应的教义阐释,为沙特现代化进程提供教义支撑。

综上,沙特在物质、人事、意识形态等层面对伊盟进行全面掌控,这使得伊盟与沙特政权体系各部门相互渗透、互相配合,在机制、理念上全面迎合沙特内政外交需求,全方位为沙特政权服务。

三、政权工具：伊盟与沙特的关系模式

自成立以来,伊盟的角色经历从最初抗衡埃及的外交工具,到促进穆斯林团结的泛伊斯兰组织,再到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转变。^⑤虽然伊盟强调自身“穆斯林社群组织”的非政府定位,但维护沙特利益的核心目标始终如一,在战略、形象、行动等层面做了诸多工作。

^① 赛义德·拉马丹是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20世纪50年代穆兄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认为是穆兄会的非官方“外交部长”。Franck Frégosi, “L'imam, le conférencier et le juriconsulte: retour sur trois figures contemporaines du champ religieux islamique en France,” *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125, January-March 2004, p. 139, 转引自 Samir Amghar,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in Europe: An Islamic Organization to Serve the Saudi Strategic Interests?,” *Journal of Muslims in Europe*, No. 1, 2012, p. 131.

^② David Commins, *Islam in Saudi Arabia*,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15, p. 162.

^③ Gilles Dorronsoro, “Les Wahhabites en Afghanistan,” *La Lettre d'Asie Centrale*, No. 2, Autumn, 1994, 转引自 Pierre Conesa, *The Saudi Terror Machine: The Truth About Radical Islam and Saudi Arabia Revealed*, p. 67.

^④ MWL,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Holy See (Vatican) Receiv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6, 2018, pp. 13-15.

^⑤ 何思雨:《伊斯兰世界联盟参与全球治理研究》,第134-136页。

（一）战略层面的利益维护者

第一,在教派政治斗争中,坚定反对伊朗及其什叶派联盟。沙特外交长期注重以宗教和教派划线,“沙特王室积极利用瓦哈比主义的宗教教义,尤其是运用其中将什叶派定义为‘异端’的教派话语,反对政治上表现活跃的什叶派少数群体。”^①自成立起什叶派势力就一直被排除在伊盟核心之外,特别是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沙特视伊朗为主要竞争对手,将遏制伊朗及其什叶派联盟势力作为战略重点,伊盟对此予以积极配合。一方面,伊盟协助沙特当局宣传并夸大伊朗威胁。伊盟官方杂志曾发表题为《伊朗比以色列邪恶 100 倍吗?》的文章,此文逻辑是伊朗主导的“什叶派之弧”面积比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面积大 100 倍,而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袭击次数也比以色列多。文章认为,伊朗才是阿拉伯土地最大的占领者和威胁者,因此伊朗比以色列邪恶 100 倍。^②另一方面,伊盟将地区争端和冲突的源头指向伊朗。2016 年 1 月,伊盟强烈谴责伊朗民众冲击沙特驻伊朗使馆事件,指出“伊朗为了政治利益利用什叶派思想,希望睿智的什叶派人士能认识到这一危险”^③。2017 年 11 月 20 日,伊盟支持阿盟外长特别会议谴责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的声明,认为“伊朗这一邪恶轴心在其干预的国家部署军事集团,通过实施一系列颠覆性罪恶活动和恐怖主义行径扩大教派冲突,对整个地区构成威胁,是国际上令人不安的麻烦来源”^④。在也门冲突问题上,伊盟直指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导弹是受伊朗支持,强调“这一绝望的侵略行径暴露了伊朗政权企图通过徒劳的教派主义行动干涉地区事务的程度”^⑤,表示“这一徒劳行动只会增强由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盟的决心”^⑥。

第二,在地缘政治冲突中,立场行动全面配合沙特。伊盟“遵循亲沙特派处理对外政策问题的方针,并用关心全穆斯林利益的广泛宣传来掩饰这个方针”^⑦。

①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5 期,第 36 页。

② MWL, “Is Iran 100 Times Worse than Israel?,”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5, No. 4, 2017, pp. 26–29.

③ MWL, “MWL Condemns the Iranian Oppressive Attack on the Saudi Embassy in Tehran,”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4, No. 4, 2016, p. 8.

④ MWL, “MWL Supports the Arab League Statement: Iran, Driven by an Ideology of Hate and Extremism,”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3, 2017, p. 11.

⑤ MWL, “MWL Condemns the Launching of Houthi’s Militia of a Ballistic Missile on Riyadh,”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4, 2018, p. 19.

⑥ MWL, “Muslim World League: The Houthi Militia’s Indiscriminate Rocket Fire is the Futile Bluster of Defeat,”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8, 2018, p. 22.

⑦ [苏] P. И. 沙里波娃:《今日泛伊斯兰主义》,达建新译,载杨发仁主编:《“双泛”研究译丛(第 3 辑)》,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1993 年版(内部印刷),第 175 页。

这突出反映在伊盟与穆兄会的关系上,双方关系随沙特对穆兄会的态度变化而变化,呈现出“拒绝—支持—限制—打压”的变化态势。早期沙特对穆兄会持谨慎和抗拒态度,拒绝哈桑·班纳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请求,不允许政治性政党或组织进入。与埃及矛盾加剧使沙特选择收容流亡的穆兄会成员,沙特与穆兄会关系开始变得紧密。但随着穆兄会的分化、调整与改革,“沙特意识到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从长远来看,如果穆兄会力量探索的伊斯兰民主获得成功并在转型阿拉伯国家推广,无疑会对以世袭制、家族制、政教合一为特征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挑战”^①。因此,沙特对穆兄会的态度从支持转向限制,特别在中东变局后极力遏制以穆兄会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势力。伊盟的话语也随即转变,直指穆兄会是恐怖组织的“孵化器”,认为其通过所谓政治伊斯兰将恐怖主义以宗教名义渗入伊斯兰教温和、和平的意识形态中。^②这一转变体现在沙特与卡塔尔关系变化上,2017年伊盟声明支持沙特和卡塔尔断交,指责卡塔尔通过包庇和资助恐怖组织来干涉他国内政和破坏别国安全与稳定,认为沙特的举措符合伊斯兰教法。同时,针对沙特、埃及、阿联酋和巴林四国声明中所列的受卡塔尔支持和资助的12个实体和59名个人,伊盟宣布免去其中优素福·格尔达维(Yusuf Al-Qaradawi)^③在伊斯兰教法学委员会和伊斯兰教法学院(Islamic Fiqh Academy)的委员职务,并呼吁下属机构领导和成员拒绝接受所有与这份名单相关人士的意识形态,确保不受这些人思想的影响。此外,伊盟还发表声明谴责卡塔尔媒体对宗教学者的煽动,称卡塔尔部分宗教学者是“信仰的伪君子”^④。

第三,在内政外交重大议题上,为沙特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撑和教法解释。维护沙美盟友关系是沙特外交的重中之重,但两国迥异的意识形态和美国“偏以压巴”的政策导向使其遭到诸多非议,特别在麦加清真寺事件、美国军队进入沙特等敏感节点给沙特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伊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2017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之际,伊盟秘书长专门撰文表示伊斯兰世界已经成为美国的“天然

① 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79页。

② MWL, “MWL Expresses Its Full Support for The Severance of Relations with Qatar,”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5, No. 10, 2017, pp. 10–11.

③ 格尔达维是埃及穆兄会的重要人物,后移居卡塔尔,任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是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④ MWL, “MWL Heads a Global Program on Shared Values,”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5, No. 10, 2017, p. 5.

盟友”,认为特朗普的访问具有积极意义。^① 凭借自身在教界的独特地位,伊盟还通过教义诠释为沙特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撑,以巩固王室统治和维护国家稳定。2017 年 6 月,在萨勒曼国王罢黜侄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ohammed bin Nayef)、任命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为王储之后,伊盟随即赞扬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优先服务于宗教,再服务于国家、国王和民族的优秀品质,表示这一任命是成功和有希望的,有助于沙特王国的持久稳定。^② 伊盟还赞扬穆罕默德王储挂帅的反腐委员会(Saudi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Nazaha*),秘书长伊萨引用先知语录来强调腐败的危害,认为腐败是阻碍国家发展的“黑洞”。对于这场针对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的大规模反腐行动,伊萨表示:“如果反腐只是从底层开始,那么精英阶层就会觉得他们是免疫的。”^③ 伊盟还援引《古兰经》为沙特主导的“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Islamic Military Counter Terrorism Coalition, IMCTC)做教义解释,^④ 增强其合法性和权威性,表示“反恐联盟是安拉向穆斯林所命定的善行”^⑤。

(二) 形象层面的舆论引导者

第一,对沙特进行多样化的美化宣传,以提高全球穆斯林对沙特领袖地位的认可和改善西方对沙特的负面印象。提升沙特“伊斯兰世界精神盟主”的崇高地位并突出国王“两圣地守护者”的特殊身份,是沙特外交的重要使命。伊盟尤为重视塑造沙特王室的良好形象,借用官方杂志的平台进行大篇幅宣传,报道慈善活动时也会感谢国王的慷慨捐赠,还会在救济包裹上附上话语及图片。针对外界对沙特封闭、保守和极端的固化印象,伊盟经常刊登长篇文章介绍沙特经济改革、反恐、保护人权和去极端化的最新举措,旨在塑造更加开放、包容、温和的现代化国家形象。伊盟还会利用秘书长的频繁出访对出访国高层和当地群众开展定向游说和有针对性宣传,并受到当地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如 2017 年 3 月伊盟秘书长在欧盟议会上的讲话就被列为该领域的基本工作文件。^⑥

① Sheikh Dr. Muhammad bin Abdulkarim Al-Issa, “The Significance of Trump’s Visit,”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5, No. 9, 2017, pp. 10–11.

② MWL, “MWL Congratulates Saudi King on Naming New Crown Prince,”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5, No. 10, 2017, p. 4.

③ MWL, “Fighting Corruption Is a Must to Achieve Development Goals, Says MWL Chief,”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4, 2018, p. 20.

④ 《古兰经》(5:2), 马坚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76 页。

⑤ MWL, “MWL Commends the King’s Speech and Announcement for Forming 34-Nation Islamic Military Alliance,”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4, No. 4, 2016, p. 6.

⑥ MWL, “EU Parliament Conference Considers the Speech of MWL’s SG as a Working Document,”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5, No. 7, 2017, p. 22.

第二,打造庞大、系统、立体的宣教体系,宣传符合沙特利益的官方瓦哈比派教义。在宣传上,伊盟积极通过多样化手段进行宣教,如发行杂志、报告和书籍,开设电视宣教频道,设立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开发电子数据平台和应用软件,成立国际伊斯兰媒体组织(International Islamic Organization for Media)等。伊盟每年派遣大批伊玛目和宗教教师赴海外宣教,选派伊玛目到其他国家主持宗教仪式,以强调其宗教正统性。在教育领域,伊盟捐建、改造清真寺,建设并控制伊斯兰协会、伊斯兰文化中心、宗教学校等宗教教育机构,举办研讨会、组织培训班,全方位推动海外伊斯兰教育。伊盟设有专门机构对《古兰经》等宗教经典进行翻译、印刷、分发,举办的《古兰经》诵读大赛在伊斯兰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力。伊盟还通过丰厚奖学金吸引外国穆斯林赴沙特留学,培养教职人员。此外,伊盟经常邀请各国教界精英参加会议,通过定期聚会与联谊扩大影响力,增强在全球伊斯兰教界的话语权。

第三,通过多种手段进行舆论造势,为沙特提供舆论引导和舆情减压。宗教色彩浓厚的沙特外交经常面临内外压力,2016年4月以来,伊朗与沙特就当年朝觐所涉及的航班线路、办理第三国签证和安全措施等进行了多轮协商,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伊盟秘书长图尔基谴责伊朗没有与朝觐组织签署相关文件,认为伊朗旨在将朝觐政治化。^①伊盟还驳斥部分媒体有关沙特阻挠叙利亚公民朝觐的报道,表示沙特平等地、无任何歧视地对待所有朝觐者,当年已安排18,000名叙利亚公民赴麦加朝觐。^②在2017年9月2日的朝觐招待会,伊盟秘书长表示将在宗教圣地建设一套高级集成系统以增加朝觐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同时直指部分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对两圣寺发动袭击。^③

(三) 行动层面的职能承担者

第一,外交活动参与方。虽然伊盟一直强调其非政府属性,但并不避讳自身沙特官方代表的身份。伊盟秘书长经常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会见各国来访高层、驻沙特大使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会议背景始终悬挂着沙特国旗和伊盟旗帜,伊盟秘书长也经常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外事活动。伊盟对外活动得到沙特政府的全面支持与配合,沙特驻外使馆全程参与伊盟秘书长的出访行动,双方还共同举办对外宣传活动。凭借庞大的海外机构系统和特殊的宗教沟通渠道,“在沙特没

^① MWL, “MWL Condemns the Attitude Adopted by Iran Aiming to Politicize Pilgrimage (Hajj) Obligation,”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4, No. 9, 2016, pp. 14-15.

^② MWL, “Muslim World League: Kingdom Serves All Pilgrims Equally and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11, 2018, p. 19.

^③ MWL, “Dr. Al-Issa Appreciates King Salman’s Directives to Host Pilgrims,”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1, 2017, pp. 10-12.

有开设使馆的一些国家,伊盟部分海外机构扮演了领事馆的角色,有时甚至取代了官方外交角色”^①。部分沙特外交官兼任伊盟海外机构的相关职务。例如,隶属伊盟的日内瓦伊斯兰文化基金会 (Islamic Cultural Foundation in Geneva) 均由沙特人负责,伊盟巴黎办事处由沙特大使馆负责宗教事务的专员领导。沙特驻比利时大使一直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土耳其、塞内加尔等伊斯兰国家的使团领导共同负责比利时伊斯兰文化中心委员会 (Committee of the Islamic and Cultural Centre of Belgium) 的工作。^②

第二,官方行动组织方。沙特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逐渐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成为世界主要援助国之一。沙特在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三个层面通过双多边渠道借助各类组织实施发展援助,不同组织各有分工与侧重。伊盟下属的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是沙特在非官方层面进行发展援助的主要依托机构。^③ 沙特近年来着力加强在反恐、去极端化、跨宗教对话等方面的活动力度,伊盟是这些活动的重要实施方。伊盟是沙特主导的“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的重要参与方,伊盟秘书长不仅参与联盟的历次会议,还积极就反恐、资金等问题提出建议,强调“军事对抗很重要,但不能根除恐怖主义,最重要的是学者之间的对抗”^④。2018 年沙特新建思想战中心 (Intellectual Warfare Center, IWC) 服务于联盟,旨在揭露关于伊斯兰教的错误和负面观念,向公众展示真实的伊斯兰教。该中心由沙特穆罕默德王储领导,伊盟秘书长负责管理。^⑤ 此外,沙特近年来在海外成立了萨勒曼国王国际和平中心 (King Salm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阿卜杜拉国王国际跨宗教与跨文化对话中心 (King Abdullah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KAICIID) 等机构,伊盟是这些机构的主要组织者和运营方。

第三,朝觐运作方。作为全球最大的跨国宗教运动,伊盟在朝觐组织、服务与保障工作中承担了诸多职责。朝觐前,伊盟海外机构与沙特朝觐部及驻外使馆合作,承担人员报名、名额分配、签证办理、路线协调等组织工作。朝觐期间,

① Pierre Conesa, *The Saudi Terror Machine: The Truth About Radical Islam and Saudi Arabia Revealed*, p. 69.

② Samir Amghar,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in Europe: An Islamic Organization to Serve the Saudi Strategic Interests?,” *Journal of Muslims in Europe*, No. 1, 2012, pp. 135–136.

③ 有关伊盟发展援助活动,详见何思雨:《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参与全球发展援助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53–86 页。

④ MWL, “Muslim Coalition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Fight Terror,”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4, 2018, p. 29.

⑤ MWL, “Saudi Adds Technology to the Work Against Terrorism,”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9, 2018, p. 49.

伊盟在提供免费餐饮、供水、住宿、交通等后勤服务基础上,还与阿拉伯新闻网(Arab News)共同设计了一款手机应用“朝觐应用”(Haji App),为朝觐者提供新闻推送、直播频道、紧急电话、使馆信息和实时位置共享等现代技术服务。^①伊盟每年会资助一些贫困穆斯林朝觐,并广泛开展慈善活动,展现自身乐善好施的形象。伊盟每年都盛情招待各国朝觐代表团,以高规格接待和特殊礼遇扩大在各国高层精英中的影响力。如伊盟会邀请各国高层和宗教领袖参加洗天房等代表宗教最高礼遇的活动,还会邀请各国贵宾参加沙特国王举行的朝觐招待会,以彰显其在全球伊斯兰事业和朝觐服务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此外,伊盟在朝觐期间还会召开各类会议来扩大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如每年的“麦加峰会”(Makkah International Islamic Conference)是沙特与前来朝觐的各国高层深入沟通的良好机会。^②

综上,伊盟全方面为沙特内政外交服务,是战略层面的利益维护者、形象层面的舆论引导者、行动层面的职能承担者。除宗教动因外,伊盟有更多政治考量,即借助教缘联系增强沙特特别是瓦哈比教派在伊斯兰世界和全球穆斯林社群的威望和影响,提升全球穆斯林对沙特的宗教认同与亲近感,全面服务沙特国家利益。

四、案例分析：沙特阿拉伯与埃塞俄比亚双边关系中的伊盟角色

沙特与埃塞俄比亚(简称“埃塞”)同为地区大国,双边关系对地区形势具有一定影响。埃塞国内有约40~45%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③伊斯兰教在两国关系发展中扮演独特角色。

沙特建国后主要奉行维护自身利益的中立外交政策,视埃塞为“异教国”,两国交往有限。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对埃塞发动侵略,受绥靖政策影响和墨索里尼利诱,沙特冷淡对待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的求助。埃塞被吞并后,意大利扶持伊斯兰教以打压埃塞正教,资助穆斯林赴麦加朝觐,两地民间交流有了一定增加。埃塞复国后,于1948年与沙特建交,但受冷战地缘政

^① MWL, “Arab News Launches ‘Haji App’ in Partnership with Muslim World League,” *The Muslim World League Journal*, Vol. 46, No. 1, 2017, p. 21.

^② 会议源自1926年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在朝觐期间召开的会议,峰会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就伊斯兰世界各类问题进行深度讨论。

^③ 《埃塞俄比亚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10月,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366/1206x0_677368/, 上网时间:2022年4月3日。

治格局的制约,双方关系依然较为疏离,费萨尔更多将埃塞视为对抗埃及的合作伙伴。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改变了中东地区格局,亲苏的纳赛尔主义难以为继,苏联加强了在中东和非洲的渗透与扩张。苏联与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的结盟使沙特面临较大压力,而苏联支持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势力^①也给亲美的海尔·塞拉西一世政权带来很大挑战。埃塞开始向沙特寻求支持,沙特支持埃塞的意图也更加明显,两国战略目标日益趋近,双方互动得到一定程度增强,但互信依然有限。1974 年亲苏的门格斯图(Mangistu Haile Mariam)上台,使埃沙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沙特加强了在非洲之角的扩张力度,增加对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势力的援助并介入索马里局势,希望借此压制门格斯图政权以削弱苏联势力。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战略收缩,失去苏联支持的门格斯图政权希望修补与沙特关系,双方关系开始缓和。冷战后,提格雷族的梅莱斯(Meles Zenawi)政权在 1991 年取代阿姆哈拉族成为埃塞掌权者。埃塞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重要的地缘位置和显著的地区地位使沙特愈加重视其作用,开始赞扬埃塞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差异的“民族联邦制”以及多元包容的宗教信仰政策,而埃塞也希望获得沙特的经济支持。此后两国关系日渐升温,1994 年埃塞与沙特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②总体上,沙特与埃塞关系受国际和地区形势影响而变化,伊盟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 开拓:促进双边关系转折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的进攻态势给沙特和埃塞都带来了巨大压力,双方战略目标日益趋近。1973 年 5 月,沙特派伊盟秘书长访问埃塞,在巡访埃塞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后暗示沙特将在经济和战略上支持埃塞。访问后,伊盟向沙特政府提供了详细报告,双边互动开始增加,官方交流正式启动。时任沙特外交大臣乌玛尔·萨迪夫(Umar al-Saqqaf)访问埃塞,承诺继续加大援助,同时会规制索马里和不支持厄立特里亚。1973 年 9 月,费萨尔和海尔·塞拉西一世在不结盟会议期间举行会谈,承诺价值 2 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作为埃塞与以色列断绝关系的回报。^③20 世纪 80 年代,伊盟成为门格斯图政权修复与沙特关系的重要渠道。1986 年埃塞允许伊盟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办事处以援助饥荒。1987 年伊盟与埃塞救济和重建委员会(Ethiopia'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Committee)签署协议,拟在戈贾姆地区(Gojjam)建设学校、孤儿院和诊所。1989 年 8 月伊盟资助了一

^① 埃塞与厄立特里亚 1952 年结成联邦。1962 年埃塞宣布将厄立特里亚并为一个州,引发厄立特里亚的武装独立斗争。1993 年厄立特里亚宣布独立,埃塞予以承认并与之建交。

^② 钟伟云编著:《埃塞俄比亚》,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9 页。

^③ Haggai Erlich, *Saudi Arabia and Ethiopia: Islam,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Entwined*,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pp. 116-118.

项旨在提升全国宗教和阿拉伯语教师教学能力的课程,并聘请利雅得伊玛目穆罕默德大学(Imam Muhammad University)的学者进行教学。由于门格斯图在海湾战争中谴责伊拉克,沙特与埃塞关系进一步升温。1990年11月,伊盟秘书长纳西夫访问埃塞,表示将继续完善教育、社会、人道主义等方面的援助。门格斯图则承诺将在人道主义领域与伊盟继续合作,表示“埃塞珍视与阿拉伯世界长久以来建立的历史联系,坚定地希望与沙特在未来加强合作”^①。

(二) 减压: 维护沙特宗教道义形象

伊盟曾长期将埃塞视为非伊斯兰的他者,积极向埃塞进行伊斯兰教宣传动员,话语较为激进。伊盟官方杂志曾写道:“埃塞有潜力成为伊斯兰国家,如果该国穆斯林被伊斯兰原则教育并训练,这需要来自伊斯兰世界艰辛的行动、奉献、规划和援助,以使穆斯林依靠他们自己立足并获得他们已被否认很长时间的正确位置。”^②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特开始将埃塞视为抗衡埃及的合作伙伴。但伊盟依然从宗教视角严厉批评埃塞的穆斯林政策,与沙特政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错位。“利雅得政权允许伊盟去控诉,它自己也给予困境中的埃塞穆斯林口头服务,但实际上它将海尔·塞拉西王国视为稳定因素。在纳赛尔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利雅得甚至准备接受埃塞与以色列合作。基督教徒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系,一段时间被视为更少的害处,甚至是抵抗共同敌人的有效联盟。”^③在此期间,沙特没有对埃塞进行施压制裁,也避免直接援助埃塞在非洲之角的反对势力。如伊盟内部主张厄立特里亚独立的奥斯曼·萨利赫·赛比(Uthman Salih Sabbe)获得的支持较为有限,他也并非厄立特里亚分离势力的核心力量。“费萨尔需要一个稳定的埃塞,一个有能力抑制地区不稳定势力的王权政府。然而,作为虔诚的瓦哈比主义者,费萨尔允许伊盟继续攻击基督教王国羞辱伊斯兰的行为。”^④

(三) 塑造: 强化埃塞“伊斯兰属性”

拥有诸多穆斯林人口的埃塞是沙特扩大瓦哈比教派在非伊斯兰地区影响力的重要目标,伊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伊盟强调埃塞伊斯兰教的悠久历史及其与中东的紧密联系。例如,先知穆罕默德与埃塞的传说成为伊盟塑造埃塞“伊斯兰属性”的着力点和历史依据。^⑤另一方面,伊盟宣传埃塞穆斯林的

① Haggai Erlich, *Saudi Arabia and Ethiopia: Islam,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Entwined*, pp. 166-167.

② Ibid., p. 165.

③ Ibid., p. 107.

④ Ibid., p. 110.

⑤ 相传先知在早期传教时受到迫害,他劝说部分穆斯林逃亡到阿比西尼亚(即埃塞),并受到纳贾什国王(Najashi)的保护。后来纳贾什去世时,先知还为他举行葬礼。

悲惨遭遇,批评埃塞民族宗教政策,强化自身穆斯林保护者的形象。20 世纪 90 年代,梅莱斯政权的上台使伊盟有了更多自由空间去介入、影响埃塞的伊斯兰教。伊盟开始赞扬其多元包容的民族宗教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埃塞伊斯兰教复兴特别是瓦哈比教义传播的举措。第一,广泛开展慈善救济,下属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和哈拉曼基金会成为在埃塞活动的最大外国非政府组织之一。第二,积极捐建、改造清真寺,建设并控制了多个伊斯兰协会、宗教学校等宗教教育机构,成为在埃塞传播伊斯兰教的重要力量。如 1991 年伊盟秘书长纳西夫在访问埃塞时就签署协议,将亚的斯亚贝巴的阿维利亚学校(AI-Awliya)^①作为伊盟直属机构运作,并在 1993 年获埃塞教育部批准。1994 年伊盟副秘书长阿德楠·巴沙(Adnan Basha)还在该校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埃塞所有伊斯兰学校的伊斯兰研究和阿拉伯语课程的统一标准。第三,组织进口、出版及翻译《古兰经》等宗教书籍,派遣伊玛目、宗教教师等赴埃塞宣教,举办面向本地宗教教师的研讨会和培训班。伊盟杂志还会刊登有关埃塞基督徒改宗的故事,甚至有指控称沙特付钱使埃塞正教徒改宗。^② 第四,通过传播阿拉伯语加强埃塞的“伊斯兰属性”。伊盟力图塑造埃塞最大人口群体奥罗莫人(Oromo)^③起源于阿拉伯人的话语,将奥罗莫人作为语言传播的主要对象,促使其接受阿拉伯语并放弃奥罗莫语。伊盟还向许多奥罗莫年轻人提供奖学金,鼓励他们赴沙特留学并返回埃塞传播瓦哈比主义,这些人否认埃塞伊斯兰教传统的苏菲派习俗,破坏老式样的奥罗莫墓穴,瓦哈比成了信教者严格遵循伊斯兰传统的形容词。^④

(四) 介入: 增强沙特地区影响力

随着沙特海外利益的逐渐扩展,它在介入地区局势和增强地区影响力的需求日益显著。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的进攻态势给沙特带来巨大压力,而亲苏的门格斯图政权则进一步刺激沙特介入非洲之角局势,伊盟成为沙特影响地区局势的重要工具。这集中体现在欧加登战争(Ogaden War)中,沙特通过伊盟等非政府组织向索马里提供援助,希望通过支持索马里来打压门格斯图政权并借此清除苏联势力。伊盟下属的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沙特

① 该校由也门移民在 1958 年建立,1973 年成为涵盖初、中、高级三个阶段的综合学校。在门格斯图统治下,该学校受到政府严格控制。1992 年开始迅速扩张,已成为非洲之角地区最大的伊斯兰学校,对伊盟在埃塞的宣教具有重要意义。

② Haggai Erlich, *Saudi Arabia and Ethiopia: Islam,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Entwined*, pp. 189-191.

③ 奥罗莫族是埃塞第一大民族,约占总人口 34.5%,主要分布于埃塞中南部。奥罗莫族内部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差异较大,一直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民族认同。

④ Haggai Erlich, *Saudi Arabia and Ethiopia: Islam,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Entwined*, pp. 208-209.

通过伊盟介入地区局势的行为招致非议,破坏了伊盟和沙特形象。有指控称伊盟通过传播激进瓦哈比主义来介入非洲之角局势,“成千上万的人被提供了奖学金,他们中大多前往麦地那伊斯兰大学(Islamic University of Medina),其他人则去麦加的乌姆·库拉大学(Umm Al-Qura University)和利雅得的伊玛目沙特大学(Imam Sa'ud University),索马里的伊斯兰教缓慢地瓦哈比化并种下了宗教差别和仇恨的种子”^①。宗教原教旨主义因素的混入导致索马里后期陷入伊斯兰极端主义危险之中,并演变为某种程度的内部宗教冲突,还有指控称索马里“伊斯兰联盟”(Al-Ittihad al-Islami)一直受到伊盟旗下哈拉曼基金会的资助。^②“9·11”事件后,随着伊盟战略重点转向文明对话,伊盟的宣传开始更多提到埃塞正教与伊斯兰教的和谐共存。伊盟成为沙特发展援助的主要依托平台。2017/2018年度它向埃塞提供约25,671,009美元的援助,惠及3,174,786人。^③

综上,沙特与埃塞关系总体较为疏离、交往有限。伊盟在两国关系发展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成为两国官方互动的先遣队,在双边关系转折的特殊时刻发挥了独特作用。伊盟在埃塞广泛开展公共外交、宗教外交和发展援助,成为沙特增强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伊盟的行动更多从宗教角度出发,有时还与沙特政府呈现一定程度错位,这种错位是沙特外交双重维度的表现,伊盟的话语并不代表沙特政府的全部意愿和真实意图,也不代表伊盟对沙特政策的偏离,伊盟依然服从于沙特整体战略,其行动更多是为了减轻沙特宗教道义压力、维护伊斯兰教形象。此外,伊盟与部分宗教激进势力的暧昧关联也给沙特国家形象造成了困扰。

五、余论：伊盟与沙特关系评析

伊盟在国际体系中是极为特殊的国际行为体。一方面,伊盟是宗教行为体,但并不是专门从事宗教信仰崇拜与传播的组织;另一方面,它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但又是服务于沙特政权的工具。通过研究伊盟与沙特的关系,不仅可以透过现象考察伊盟的组织特质与行为逻辑,把握以伊盟为代表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具体作用,还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深

^① Medhane Tadesse, *Al-Ittihad, Political Islam and Black Economy in Somalia: Religion, Money, Cl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Over Somalia*, Addis Ababa: Meag Printing Enterprise, 2002, p. 17, 转引自 Haggai Erlich, *Saudi Arabia and Ethiopia: Islam,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Entwined*, p. 147。

^② Haggai Erlich, *Saudi Arabia and Ethiopia: Islam,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Entwined*, p. 205.

^③ 何思雨:《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参与全球发展援助研究》,第84-85页。

层理解沙特外交的多重面向。“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发挥以及发挥的功能是正向还是负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不取决于它自身的组织运作,而在于它所持的宗教意识形态与其对象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也取决于该组织与其主体所在国的关系。”^①因此,伊盟未来的发展需要置于其与沙特关系的框架下去讨论。

自成立以来,伊盟在近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诸多积极作用和影响。第一,借助非政府组织身份和官方背景,在很多沙特政府不宜介入或是能力不及的领域,伊盟可以更为方便地穿梭其中,在沙特对外关系的开拓与转折中扮演先遣队和沟通者的角色,为政府间接触提前铺路,成为官方活动的有益补充,一定程度拓展了沙特外交范围和国际空间。第二,有时沙特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行动会损害其“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形象,伊盟的激烈言辞和相对错位行动可以减轻其宗教道义压力,促进宗教理念与国家利益的有效平衡。第三,沙特的支持使伊盟具备其他组织不具有的资源优势,是它发展为世界最大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依托。借助自身的非政府组织身份,伊盟推广的瓦哈比教义已深入许多穆斯林聚居区,改变了当地宗教生态和地区力量对比。伊盟成为沙特介入地区局势、塑造舆论议题的代理机构,有利于在多层面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第四,基于伊斯兰信仰的认同资源、网络资源及其所派生的物质与政治资源,伊盟在宗教和非政府等层面通过各种手段服务于沙特整体对外战略,成为沙特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丰富了沙特外交的手段、方式和领域,有效提升了沙特的整体外交能力和国家影响力。

与此同时,伊盟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其受到外界诟病。第一,强烈的宗教属性使伊盟必须强化自身“穆斯林保护者”的形象,采取了一些旨在刺激“伊斯兰教复兴”特别是瓦哈比教义传播的举措,这使得相关国家出于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伊盟进行限制,制约了其行动能力和范围。此外,宗教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伊盟的世俗性和现代性不足及相对封闭性和保守性,使其在当前日趋全球化的世俗国际体系中显得格格不入。而伊盟少数机构和个别人员的涉恐行为,也给伊盟和沙特形象造成了一定困扰。第二,伊盟行动带有较强政治目的性,在诸多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与沙特保持高度一致,在目标选择、行动实施等方面以沙特整体对外战略为导向,特别在教派竞争、地缘政治博弈等事务中表现突出。沙特的决定性话语权在事实上削弱了伊盟的非政府属性和独立性,使其难以形成较为中立与公正的立场,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宗教偏向。很多国家将伊盟视为沙特政权系统的一部分,影响其作为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

① 李峰:《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载《求索》2006 年第 8 期,第 98 页。

公信力,造成伊盟政策局限性较为明显,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也有所欠缺。

未来,伊盟的发展仍取决于其能否处理好自身与沙特的关系,即在依托沙特资源的同时,增强自身的主体性、自主性、中立性和公信力,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

一是沙特内部政权与教权的关系。作为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教派结盟的政教联盟国家。伊盟早期在意识形态、人员构成等方面更多倾向于沙特宗教保守派,在理念、政策和行动上与沙特政权呈现一定程度的错位,表现得更为保守和激进。但随着沙特政权与教权在相互合作、制约与抗衡中逐渐从政教联盟走向政主教从,伊盟政策行动与沙特国家战略走向和政权需求的差异性日渐缩小,并逐步走向高度一致。

二是宗教保守性与世俗现代化的关系。坚持宗教传统是沙特的立国之本,但在当前世界世俗化、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压力和冲击下,沙特需要在坚持国教传统和国家现代化中保持平衡。伊盟逐步降低了自身的宗教性、保守性和激进性,致力于成为温和伊斯兰的代表,表现得更具包容性和现代性。

三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美沙关系是沙特外交的主线,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复杂矛盾一直给沙特外交带来困扰,而西方世界对伊盟等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更是持负面印象,给伊盟海外活动设置了诸多障碍。伊盟必须在切断与涉恐组织及个人关联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传播温和伊斯兰和促进文明对话,意图重塑伊斯兰教、沙特和伊盟在西方世界的形象。

随着全球化日趋深入,国际组织的作用正日益上升,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行为体,其资源、权威和行动力具有绝对优势,国际组织依然需要依靠主权国家才能有效开展行动。以伊盟为代表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应形成协调互补的关系,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通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可以获得更多资源,政府也可以借助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服务于自身战略,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取决于国家政府的态度。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